



JESL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in Literature

JESL, Vol. 1, No. 1, 2026, pp.140-150.

Print ISSN: 3107-3492; Online ISSN: 3107-35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esl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esl260110cncfp>



论《威尔士歌谣》中的危机叙事与虚拟地方建构

龙瑞翠 (Long Ruicui)

摘要：19世纪初，工业化与城市化急剧改变威尔士地理景观，大量承载民族认同的历史遗迹随之湮没。长达两百余年的被殖民史使威尔士在政治与经济上长期依附英格兰。曾经植根于独特地方特性的本土经济文化想象，不断被英格兰主导的资本秩序所压制，威尔士的文化话语权日益边缘化。于是，威尔士精英转而诉诸文化实践，发掘传统记忆中的“地理基因”，构建虚拟的“古威尔士”世界，以期在象征层面重塑民族经济文化想象，应对威尔士文化长期被英格兰主流叙事遮蔽的困境。赫曼斯正是这一文化抵抗的重要实践者。本文以其诗集《威尔士歌谣》为研究对象，探讨诗人如何通过书写具有威尔士地理基因特质的景观，编织以虚拟地方为载体的危机叙事，参与威尔士文化圈培育虚拟古威尔士世界的集体实践。研究发现，在持续重构的不列颠政治经济秩序之下，诗人借诗意书写重建民族经济文化想象，为威尔士塑造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助力其争取文化独特性与发展话语权。

关键词：费利西亚·赫曼斯；《威尔士歌谣》；危机叙事；虚拟地方

作者介绍：龙瑞翠，教授，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电子邮箱：445824077@qq.com

Title: On Crisis Narr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ictitious Place in *Welsh Melodies*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drastically transformed Wales's geographical landscape,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numerous historical relics that underpinned its ethnical identity. Subject to over two centuries of colonial domination, Wales had been subordinating to England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The indigenous economic-cultural imaginaries, once deeply rooted

in Wales's distinctive regional traits, were increasingly suppressed by the English-led capital order, marginalizing Welsh cultural discourse as a consequence. Confronted with this crisis, Welsh intellectual elites resorted to cultural revival practices. Namely, by excavating geographical genes embedded in traditional cultural memory and constructing a fictitious world of "ancient Wales", they endeavored to reshape, at a symbolic level,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agination, to counter the persistent erasure of Welsh culture within England's dominant meta-narrative. Felicia Hemans stands as a pivotal practitioner of such cultural resistance. Taking her poetry collection *Welsh Melodies* as the research focu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poet portrays landscapes imbued with authentic Welsh geographical essences, and weaves crisis narratives embodied by fictitious places, to engage in the collective cultural endeavor of cultivating a fictitious ancient Welsh world.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amid the continuously reconfigured politico-economic order of Britain, Hemans reinvents Wales's national economic-cultural imaginaries via poetic writing, carves out a unique cultural identity for the Welsh, and facilitates its strive for cultural distinctiveness and discursive autonomy.

Keywords: Felicia Hemans; *The Welsh Melodies*; crisis narrative; fictitious place

Author Biography: Long Ruicui, PhD,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445824077@qq.com.

正如文化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杰索普所言：“不同的经济想象会催生出差异化的危机叙事与政策应对方案。”（Jessop, 2015, p. 97）虽然威尔士民族曾拥有悠久的文明，但自 16 世纪实际沦为英格兰殖民地后，经济便日趋依附于英格兰。18 世纪下半叶起，来自英格兰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席卷威尔士，在重塑地理景观的同时，也因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导致承载民族文化记忆与地域认同的历史遗迹随之湮灭。为维系本民族文化的存续活力，同时回应经济转型进程中出现的族群凝聚力弱化困境，威尔士精英群体开始主动挖掘传统文化记忆中蕴含的地理基因，并以这一核心要素为根基，虚构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古威尔士世界”，以此凝炼并强化“威尔士性”的核心内涵。他们期望通过这一文化建构实践，唤醒族群成员内心深处的地方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进而在持续重构的不列颠政治经济秩序之下，打造专属威尔士的文化符号，为威尔士争夺文化话语权、拓展差异化发展空间注入核心动力。

在这一文化实践中，被誉为“19 世纪最娴熟掌握地理知识的说书人”（Simpson, p. 176）的赫曼斯（Felicia Dorothea Hemans, 1793-1835）又是重要战将。邓肯·吴在《浪漫主义选集》中曾说，尽管赫曼斯生于英格兰，但她视养育她的威尔士为故乡，她的作品中贯穿着对威尔士的深沉热爱（Wu, p. 1294）。然而学界却常常忽视她作品中的威尔士性。桑奇兹甚至认为赫曼斯是一个英格兰民族诗人，将英格兰认定为是自己的家，在其作品中极力将这个“家”设定为战争的避难所和个体精神与情感重生之地（Sanchez, p. 410）。事实上，赫曼斯的创作深度契合威尔士精英的文化诉求，在她的代表作《威尔士歌谣》（*Welsh Melodies*, 1822）中更是将威尔士地理景观书写与历史想象、民族情感深度融合，参与威尔士族裔民族重塑和不列颠国家民族建构。因此本文以文化政治经济学为研究视角，从《威尔士歌谣》入手，探讨诗人如何通过编织以虚拟地方为载体的危机叙事，来参与威尔

士文化圈的虚拟古威尔士世界培育运动，为威尔士塑造自己的专属文化标识，助力其争取文化独特性与发展话语权。

一、危机叙事的催生：虚拟地方培育

位于不列颠岛西部的威尔士东接英格兰，南临布里斯托海峡，西面和北面被爱尔兰海环绕，纵贯威尔士的坎伯兰山脉使威尔士境内遍布贫瘠荒芜的崎岖山地和丘陵。——据琼斯的考证，大概从三叠纪时期开始，威尔士群山（Welsh massif）就已经是威尔士地理景观的主要特征和威尔士地方特性的重要表征^①。

多山地的自然环境和诸子均分遗产的独特习俗使威尔士境内从罗马不列颠到诺曼英格兰时期一直并存着多个王国政权。这些政权长期为争夺“威尔士国君”（Prince of Wales）的称号而征战不休，不仅给了外族入侵的可乘之机，更削弱了威尔士人抵御外敌的能力。1066年，征服者威廉（William I, 1066-1087在位）控制了进入威尔士的三条最主要道路，英格兰开始权力渗透、操纵乃至蚕食威尔士。1282-1283年，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 1272-1307在位）更是发动威尔士远征，彻底消灭了威尔士境内最强大的格温内思王国（Kingdom of Gwynedd），促成了《威尔士法典》（*The Statute of Wales*, 1284）的订立——该法案规定被征服的威尔士王国的土地及居民均合并于英格兰王国，直接隶属于英王，改革土著威尔士人的法律习惯，推行英格兰的郡县制和司法制度；以官职奖赏的方式^②彻底改变威尔士的政治与权力结构；大量屠杀在威尔士宗教和政治生活中扮演极其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威尔士文化传承者的游吟诗人巴德。

都铎王朝的开创者亨利七世（Henry VII, 1485-1509在位）为巩固君权合法性，极力证明自己的威尔士血统，并一反以往“不准威尔士人在城市或城市周边拥有土地，不得担任王庭官职，不能承担陪审团职责，更不得与英格兰人通婚”的严厉政策（Rowse, p. 45），以各种怀柔政策换取威尔士人心甘情愿地归顺英格兰。然而《威尔士法律和司法法案（其施行形式与制度和英格兰等同）》（*An Acte for Laws & Justice to be ministred in Wales in like fourme as it is in this Realme*, 1535）和《针对君王陛下在威尔士领地和公国的某些条例之法案》（*An Act for certain Ordinances in the King's Majesty's Dominion and Principality of Wales*, 1543）的接连出台，表面上赋予威尔士人与英格兰人同等的行政、经济和司法权，实则标志着威尔士被完全并入英格兰。正如杰索普所言，“霸权[……]是依托并经由国家，对文化、政治与经济进行战略选择性接合的系统性建构。”（Jessop, 2008, p. 23）此后，英格兰依托政府力量运用多重策略牢牢把控其在英—威关系中的话语主导权：所有关于威尔士人口、经济的官方和学术统计数据，均归入英格兰数据体系一并公布；英语取代威尔士语成为威尔士官方语言，以确保英语文化自上而下的权威；英格兰人编纂的威尔士编年史将威尔士的内政外交事件悉数设置为英格兰历史事件的陪衬。威尔士被彻底置于以英格兰为权力主体的英国政府的管辖之下，逐渐沦为英格兰在不列颠本岛的第一个内殖民地（internal colony）。

到18世纪末，英国迅速从农业向工业社会转型，旧传统或被彻底摧毁或正艰难维系。

^① 详见琼斯在《威尔士及其邻近地区的地质演变》（Jones, Owen Thomas. “The Geological Evolution of Wales and the adjoining reg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111, 1956, pp. 323–351.）中的相关描述。

^② 即将有影响力又能为己所用的威尔士前贵族及宗族头领逐步吸纳到威尔士权力中心，而后又鼓励他们将其权力范围内的小官职分派给认同英格兰统治的威尔士乡绅，最终在1300年前后形成了认同英格兰君王统治的威尔士官吏阶层雏形。

为缓解社会矛盾并适应新的社会模式，社会精英纷纷借用传统社会中的旧材料来组织、建构出貌似“古老”却顺应时代所需的文化传统。威尔士精英也试图重新发现“过去”，期望借助古老的威尔士文化传统来消解现实困顿。据格鲁姆的研究，威尔士精英首先自视为古布列吞人的后裔，在不列颠民族形成初期沉浸于自我营造的民族优越感之中（Groom, p. 371）。然而，英威联合中弱势合作伙伴的身份却越来越猛烈地消解着这一优越感，并最终“引发了威尔士民族的内部分裂和身份困扰”（Jenkins, p. 46）。

恰逢其时的凯尔特复兴热潮（Celtic Revival）似乎为他们提供了新出路。但不幸的是，几百年的内殖民史切断了他们直接追溯凯尔特文化渊源的途径。众所周知，威尔士文化主要通过巴德的口头叙述以及僧侣与抄写员的文献书写来传承延续。18 世纪下半叶之后，英格兰主导的英国政府为了在威尔士顺利推行内殖民政策，加强实施语言高压政策力度，导致威尔士语人口锐减，巴德口头传承几近绝迹。与此同时，英威合并之前的连年战火，合并后传统威尔士乡绅阶层（Welsh gentry）的迅速消亡，以及新乡绅阶层因倾慕英格兰文化而摒弃威尔士语言文化，使得原本珍藏于乡绅私人图书室中的威尔士历史文献几乎被销毁殆尽，威尔士纸质传承濒临灭绝。在英格兰文化威权下，威尔士历史正在被遮蔽、篡改甚至抹杀，威尔士人对民族连续性、共享记忆与集体命运的感知日益钝化。这不仅极可能导致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断乃至灭绝，更使威尔士人参与“不列颠国家民族”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危机空前加剧。

正如民族史家史密斯在《民族认同》中所指出的，民族性本质上不仅是一种风格或政治学说，更是一种文化形式；其形成的核心前提是族群的独特性，即“所保有的那些与众不同的神话、记忆、象征符号与价值中内含的文化亲缘性”（p. 40）。其中，关于共同祖先的神话尤为关键，而祖地则是孕育和承载这些神话、记忆与传统文化的核心场所——一个个体在此获得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史密斯进一步强调，族群精英常常会识别出一块能够实现历史性集体救赎的神圣祖地，赋予自然景观以历史意蕴，同时将历史遗迹自然化，从而培育出富有诗意的“地方”，由此激发族群的怀旧与认同之情（p. 157）。威尔士精英的实践恰好印证了这一逻辑。但正如卢梭所言：“每个人群都拥有或必须拥有一个特性；倘若它没有，我们就必须从‘赋予它一个’开始。”（Rousseau, p. 319）以诗人、古籍收藏家、研究者和伪造者穆尔甘纽格（Iolo Morganwg，本名爱德华·威廉斯，1747-1826）为代表的威尔士文化圈，便是这一民族特性的主动“赋予者”。

受古文物研究者罗兰兹（Henry Rowlands, 1655-1723）影响，穆尔甘纽格早年曾奉安格尔西岛（Anglesey）为威尔士的发祥地。然而 18 世纪末他亲赴该岛考察时却发现，罗兰兹的描述过于浮夸，甚至包含大量虚构成分。但罗兰兹的历史虚构行为也启发了他：与其被动接受不可靠的叙事，不如主动虚构一段更为可信和系统的威尔士辉煌史。穆尔甘纽格这一虚构冲动从根本上说是威尔士长期经济依附于英格兰、在工业化浪潮冲击下族群凝聚力不断弱化所催生出的文化自救行为。他意识到，回溯与反思民族历史是展望和探索民族未来的必要前提。就像史密斯所言，“利用任何可获得的文化材料，为一个历史与文化共同体创造一套条理清晰的神话体系和象征符号”（p. 54）是一个民族生存与统一的关键条件，穆尔甘纽格以家乡南威尔士的格拉莫干郡（Glamorgan）为中心，想象建构巴德传统，并通过编创诗歌、伪造历史文稿等方式，大量制作描述古德鲁伊德教义教规的文献，虚构出一个庞杂而富有诗意的古德鲁伊德世界。

这一德鲁伊德世界及其所秉承的哲学思想，在 19 世纪威尔士文化圈中影响极广，甚至被当时的学界认定为凯尔特民族文化与精神遗产的一部分。它不仅赢得了大批威尔士文化精英的认可，也吸引了许多亲威尔士的英格兰精英参与其中，成功掀起了威尔士文化的第

一次复兴（Eisteddfod Revival）——一场以创造性复古德鲁伊德文化传统和神话哲学体系为特征、对威尔士文化发展影响深远的“新德鲁伊德”运动（Neo-Druid Movement）。该运动的参与者通过系统整合威尔士的独特文化符号与物质维度，将铁器时代信奉多神教的凯尔特人奉为先祖，宣称自己是旧有神话传说的“搜集者”、“整理者”与“编纂者”，选择性收集甚至伪造族群记忆的神圣源泉，包括民族祖地的自然景观及其所关联的“黄金时代”的神话传说，并将其视为体现本族群独特性的最重要元素。由此，生存焦虑被转化为文化重构的动力。凭借一种超越文化猎奇与怀旧感伤的历史想象，他们书写并构建出一个异质于英格兰主流文化的“诗意地方”，为长期处于依附地位的威尔士争取文化自主性与话语权，以重获新生并持续发展。这一建构既回应了杰索普所说的“危机叙事”，也践行了史密斯所揭示的“祖地-神话-认同”建构路径，为威尔士人提供了一幅民族认知地图，重建了族群的集体感与尊严感。

赫曼斯便是这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她在《威尔士歌谣》开篇即申明，自己的歌谣集并非为了再现真实历史，而是“为鲁思音威尔士文学圈（Ruthin Welsh Literary Society）所作”（Hemans, 1860, p. 145）。在威尔士经济长期依附于英格兰、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不断侵蚀其文化记忆的背景下，这一声明本身便是她以歌谣为媒介进行象征文化生产、回应现实危机叙事的生动例证。而且她在《威尔士歌谣》中以极具威尔士特性的地理景观为创作起点，娴熟运用歌谣韵律，从历史、信仰、语言及其文化传承者巴德等多个维度紧扣威尔士“地理基因”，想象构建一个既保有传统民族文化特质、又具有动态发展能力的诗意威尔士世界，也事实上参与了威尔士文化圈对“诗意虚拟威尔士地方”的集体培育，为威尔士人重新确立民族文化的归属点，修补了因殖民与工业化而断裂的民族历史。因此，从地理景观入手勾勒歌谣集中的地理影像图，可以清晰厘析诗人对威尔士民族情感结构的认知，及其对威尔士文化身份定位与命运走向的思索，进而窥探赫曼斯所代表的威尔士作家群的创作内核与价值成果：立足本土地理空间、以诗意景观重构地方经济文化叙事，即，借象征性文化生产消解威尔士的现实依附困境、以诗意地方书写争夺文化自主权的威尔士现代民族建构实践。

二、危机叙事的回应：虚拟地方构筑

事实上，在威尔士经济长期依附英格兰、工业化浪潮不断侵蚀本土文化的背景下，对民族黄金岁月的建构不仅是一种情感慰藉，更是由特定经济想象所催生的危机叙事。赫曼斯在《威尔士歌谣》中以诗学手段编织的就是这样一套危机叙事：从集引《威尔士竖琴》（*The Harp of Wales*）到结篇《查得尔山脉》（*The Rock of Cader Idris*），21首诗通过对具有典型民族内涵的地理名称进行历史想象，再现威尔士被压迫、被边缘化乃至被抹除的民族记忆，期望能唤醒族群的本土依恋，捍卫民族/地方本色；由此将依附处境下的生存焦虑转化为地理诗学的抗争，在英格兰主导的国家秩序中为威尔士争取文化上的自主表达空间。

根据段义孚的观点，当恋地情结变得强烈时，“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p. 140）。赫曼斯在《汪洋绿岛》（*The Green Isles of Ocean*）中便是如此：她以广角镜头呈现一座“汪洋黑屿”——被茂密森林覆盖、静卧于大洋安详怀抱的绿色仙岛，洒满阳光，散发神性光芒，直抵英灵安息之处。诗人以此唤醒读者对那曾有勇士与巴德驻留的、如梦如幻的往昔记忆。这座黑屿实为威尔士圣岛安格尔西岛，罗马人称之为“蒙纳”（Mona）。历史上的蒙纳岛承载着深重创伤：公元61年布狄卡起义爆发后，不列颠总督保里努斯在此大肆屠杀德鲁伊德祭司与信徒，最终于公元78年将整个威尔士纳入罗马帝国版图。信奉太阳、独立自由的德鲁伊德威尔士（“我即是我的中央”）从此沦为罗

马帝国的附庸（“我只是中心之外的一个小地方”）。这场冲突不仅是军事征服，更是两种经济想象的碰撞：一方是中心榨取边缘以实现帝国积累的模式，另一方是依赖分散自治来维持地方生存的模式。

赫曼斯的诗歌正是对威尔士历史创伤及其经济文化想象遭受挤压的深刻文化回应。她拒绝重复英格兰征服叙事中的屠杀与牺牲，转而以神话化的笔触将血腥历史中的蒙纳岛化为“阳光仙岛”，为威尔士人建构一套独立、正面的岛屿记忆，从而让威尔士历史叙述摆脱对英格兰征服逻辑的依赖。而当威尔士拥有了自身的神圣空间与英雄谱系，英格兰“文明开化”的叙事便失去了合法性，威尔士长期经济依附的文化根基也随之动摇。于是，那座曾经沦陷的岛屿升华为既扎根于神话与民族记忆、又映照在现实威尔士人身边风景中的神圣空间。由此，蒙纳岛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景观（landscape），成为威尔士人的心灵景观（mindscape）^①，向其居民“提供诸如梦想、思想和情感之类的东西……而且它本身也是构成我们的性格和身份的要素”（史密斯，p. 58）。通过这种诗意转化，赫曼斯在英格兰主导的秩序中为威尔士开辟出一片文化自主的象征领地。

此外，赫曼斯还大量书写以蒙纳岛作为地理中心的各种德鲁伊德庆典、习俗和文化符号等。以歌谣集首诗《德鲁伊德赞歌：罗马人登陆》（*Druid Chorus on the Landing of the Romans*）为例。虽然该诗以“罗马人登陆”为名，却既不致力于赞颂罗马文明之光，也不哀书罗马军团铁蹄所到之处的生灵涂炭，而是细致描绘德鲁伊德信徒在蒙纳岛古老橡树下祭祀祈祷的图景，鲜活复现与希腊多神教具有高相似度的德鲁伊德信仰生活：与基督教信仰不同，他们奉大自然为母，视之为家园所归，与自然界万物为友，将“橡树”视为圣物，所有神圣祭祀活动都在圣树下举行；当彪悍的罗马人来犯时，视国土为神的土地、誓死捍卫国土的德鲁伊德信徒自然也聚集在圣树下，祈求诸位神明的护佑，坚信

凭那端自黑屿秘林，
风暴渊海亦得听令
之可畏无形威势力，
罗马人！滚出吾疆！（Hemans, 1860, p. 145）

他们祈求这令人畏惧的黑屿秘林能够赐予自己力量，从而把号称所向披靡的罗马军团驱逐出威尔士。赫曼斯通过复现德鲁伊德信徒的战争危机叙事模式——外敌入侵→祭祀→求助多方神明→成功/失败，赋予了德鲁伊德文化一种与希腊文化相同的神性光芒，而威尔士人作为德鲁伊德后裔，也因之具有了泛着神性的文化之根。

赫曼斯诗中提及的德鲁伊德信徒原是地中海凯尔特人的一支。他们携多神信仰定居威尔士，其经验与思想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塑成了威尔士文化。德鲁伊德信仰因此被视为威尔士民族精神的灵魂，“德鲁伊德”也成为《威尔士歌谣》的高频词。这种精神印记在诗集中随处可见：不仅复现了德鲁伊德信徒的祭祀仪式，还再现了那些陪伴他们走过无数黑暗岁月、早已成为威尔士文化记忆底色的民谣、民乐器以及歌者。作为威尔士音乐专家，赫曼斯深知音乐是威尔士人生活中永不缺席的存在，是凝聚民族情感的精神财富。她在诗集中

^① 南威尔士历史学家戴·史密斯以“心灵”（mind）一词来替掉“景观”（landscape）一词中的“土地”，提出“心灵景观”（mindscape）一词，他认为心灵景观由特定区域内的物理、地理特性决定，但同时也受文化、想象和建筑等因素影响（see Smith, Dai. *Aneurin Bevan and the World of South Wales*.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3, pp. 92-93.）

反复书写威尔士竖琴（The Harp of Wales），坚信罗马人或撒克逊人都无法让高贵的竖琴之音停歇；描绘可奏乐可盛酒的号角，高扬德鲁伊德信徒捍卫国土的决心；更大量着墨威尔士民乐的灵魂——游吟诗人巴德。集题“歌谣”本身便昭示诗人与巴德的渊源：从玛多格（Madog）、格林多（Glyndŵr）、豪厄尔（Howel）到安奈林（Aneurin），古威尔士巴德与赫曼斯这位当代巴德的吟唱共同构成了歌谣集的主体。正如贝利和阿提金森在《发现不列颠》中所言，作为威尔士民族文化遗产的歌手，巴德通过弹竖琴吟唱远古故事传承威尔士习俗，影响威尔士人的生活（Berry & Atkinson, p. 272）。就连威尔士国歌也称威尔士是“歌者云集的土地”。此外，赫曼斯在《卢沃奇·亨的哀悼》（The Lament of Llywarch Hen）、《塔利耶森的预言》（Taliesin's Prophecy）、《欧文·哥林多的战争之歌》（Owen Glyndwr's War-Song）、《豪厄尔之歌》（Howel's Song）等诗中还模拟凯尔特音乐风格，诗意复现巴德边弹竖琴边高歌英雄传奇的场景。这既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了先辈为民族自由付出的卓绝代价，也透露出她对现实中威尔士人生活的深切悲悯。

结合威尔士依附于英格兰的经济格局、工业化进程不断侵蚀本土文化记忆的历史语境，从经济文化想象的维度审视赫曼斯对德鲁伊德信仰、巴德传统及竖琴、号角、凯尔特音乐风格等的密集复现可以发现，她的创作实践早已超越单纯的文化怀旧，实则是对威尔士本土经济文化图景的符号重塑。工业革命在推动英格兰崛起的同时，将威尔士固化为其农产品与矿业原料的附庸产地，资本主导的经济秩序不仅以烟囱、矿井摧毁了威尔士的自然地理风貌，更从根源上瓦解了依托土地而生的本土经济文化想象。而且，正如汤友云与季水河所言，“土地维系着特定的历史、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保障了社会稳定性、生活确定性、身份认同感和生理安全感”（p. 128）。然而铁路扩张与城市化浪潮却迫使大量威尔士青年为生计远赴英格兰，在经济裹挟下背弃母语与传统，族群凝聚力日渐涣散，原本扎根乡土的经济文化共同体逐步瓦解。正是在这一英格兰资本逻辑支配的经济依附与文化失语危机中，赫曼斯以威尔土地理景观为载体，借助游吟诗人的历史想象重构德鲁伊德平和坚毅的民族原型，诗性复现其信仰传统与抗争历程，建构起抗衡外来主流叙事的德鲁伊德精神世界。这种对德鲁伊德精神传统的诗意重构，不仅为威尔士人重塑了文化身份与精神坐标，更在殖民化的经济文化秩序之外，重新唤醒民族自主的经济文化想象，为威尔士民族存续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于是，赫曼斯在称呼绝大部分承载威尔士历史文化内蕴的地名时都用威尔士语，却在称呼威尔士圣岛时更愿意用罗马人的称法“蒙纳”（Mona）而非威尔士语“安格尔西”（Anglesey）的谜团也解开了。史密斯曾说，族群精英在复现传统诗意地方时，其兴趣“并不在于为了历史本身而去探寻‘他们的’过去，而是要对‘他们的人民’如何与特定领土相联系的历史神话予以重新解释”（p. 157）。英威合并以来，英格兰主导的政府表面上积极支持威尔士语的发展，实际上却始终认为，“让威尔士语继续存在既不安全也无法实现其政治目的，因此政府极力[……]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阻碍、限制乃至禁止使用威尔士语”（Jones & Williams & Pughe, pp. ix-x）。雷蒙·威廉斯在《谁为威尔士发声？：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中也指出，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政府不仅大量建设各种英语学校来推行政治与文化殖民，还以行政命令和舆情导向等诸多手段在民间广泛推行“禁止讲威尔士语”（Welsh Not）政策^①，使得讲威尔士语的人口锐减（Williams, p. 22）。为了

^① 该政策的典型施行方法是，学校（尤其是在小学）备有刻着“WN”标记的木牌、戒尺或棍子。学校里第一个被发现说威尔士语的孩子被迫戴上这一标记物，直到他发现并向老师揭发有另一个说威尔士语的孩子，他就可以将这一标记物转到那个孩子身上，然后获得解脱。持有这一标志物的孩子不仅会被体罚，还会遭受同学老师的孤立和冷眼。尽管这一做法只是民间政策，但对威尔士语破坏性极大，因为它在孩子中间生

推行或顺应吻合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政策，很多英格兰人都支持该项政策，将威尔士地区语言的英语化作为改良运动在语言发展领域的主要目标，他们在将英语包装成进步与现代化代名词的同时，“把威尔士语贬低为荒谬历史的垃圾场”（Jenkins, p. 39），导致讲威尔士语的威尔士人沦为自己家园的他者。

讽刺的是，威尔士人最初对这一政策并没有太大争议。在功利化的生存逻辑面前，原本依托语言与乡土共同体形成的传统经济文化想象，迅速让位于英格兰主导的经济文化秩序。对普通劳工而言，会英语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他们不仅自己趋向于讲英威双语，也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学英语，导致讲威尔士单语的人口迅速被稀释。更严重的是，大部分威尔士精英阶层也未意识到全民英语化的危害，反而认为威尔士语阻碍了威尔士的发展。其时，一个致力于内部统一的大不列颠民族正在形成，意味着旧的民族身份与民族关系正在重新洗牌。语言作为实现民族凝聚的隐在方式，在这一重新洗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列颠民族内各族群均意识到，“只有消除语言障碍才能真正形成不列颠民族”

（Jones, p. 15）。由于英格兰在不列颠民族中占据绝对强势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英语顺理成章地成为大不列颠民族通用语。出于经济及自身发展考虑，很多威尔士精英主动放弃威尔士语，并纷纷远走伦敦以获取更好资源，导致威尔士人才流失日愈严重，以威尔士语创作的威尔士题材作品锐减速度惊人，威尔士严重缺乏能够记录威尔士民族特性的当代巴德，这不仅意味着威尔士文学无法在新不列颠民族文学中获得有分量的地位，更意味着威尔士文化传承者的缺失。换言之，以去威尔士语的方式来获取新民族身份的做法不仅没有让威尔士摆脱自己的殖民地命运，反而使之丧失民族自我叙事能力，从而越来越深地沦为英格兰的一个“地方”，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都在日益英格兰化。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赫曼斯在歌谣集中反复使用“蒙纳”代替“安格尔西”，是在以一种历史戏讽的方式“应和”这场英语化的“语言障碍消除运动”，隐晦地批判英格兰对威尔士施行的强权内殖民政策和当时威尔士民众以去威尔士化谋求新文化身份的做法：英语通用化正如当年的罗马语通用化，正在并将更深广地破坏威尔士语及其文化的生存空间，倘若威尔士人尤其是精英们继续扮演扼杀威尔士语/文化共谋的角色，而不思改变现状，必将导致威尔士语/文化的彻底消亡，最终将连威尔士民族圣岛的本名亦为人所忘，这是怎样一种民族耻辱？！

在史密斯看来，即使古老的族群语言衰落了，但通过返归族群方言，挖掘族群历史，甚至是“创造一种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神话、历史和语言传统的普遍自觉意识”（p. 19），可以使族群观念具象化地保留在族群成员认知之中。因此和其他威尔士游吟诗会成员一样，赫曼斯也将巴德作为她复现威尔士文化的重要一步，认为他们是诚实高贵的和平爱好者^①，恰是他们对古老故事的回忆与赞颂，使久远的历史历历在目（《森林之焰》，*The Mountain-Fires*），也只有他们的小调才能将日暮中美丽而荒凉的祖国唤醒（《王子玛多格的告别》，*Prince Madog's Farewell*）。而巴德的歌谣自然离不开孕育它的地方——威尔士尤其是突显威尔士地理景观特性的山地。因此赫曼斯在《巴德的临终预言》（*The Dying Bard's Prophecy*）、《塔里耶森的预言》（*Taliesin's Prophecy*）等诗中坚称，尽管传承威尔士历史的巴德已经亡故，但因为我们的语言、历史和文化都揉在我们的血液传承里，只要青山依旧在，那令人骄傲的语言（文化）便一直都在：

成并强化“英语更高级”的思想。

^① 海曼斯在1823年5月14日的信中描述了古游吟诗人的衣着与身份，认为他们是信奉真理的完全和平使者，所到之处，战争会立即终止。（see Chorley, Henry Fothergill. *Memorials of Mrs. Hermans with Illustrations of Her Literary Character from Her Private Correspondence* (vol.1). Saunders and Otley, 1836. pp. 98-99.）

一句预言在爆裂声中由远及近，
告之我这高贵言语将永不消音
自由者将拨动蒙纳秘林之竖琴。

[.....]

只要亚文群山仍高耸入云，
只要群山仍覆主宰风雨之秘林，
则帝国犹存，则高贵言语不消音
自由者将拨动蒙纳秘林之竖琴！（Hemans, 1860, pp. 148-149）

此时的威尔士已经不仅是“一方土地的地理方位与物理空间”，也“是人与自然地点建立意义的精神空间”（罗易扉，pp. 148-149）。尽管外来入侵者严重破坏了威尔士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等，但只要作为威尔士人地理基因的青山秘林犹在，作为历史传承与地理叙事的载体——威尔士语便始终都在，威尔士人便可以通过一次次重拾神性的民谣，重读“印刻在地理标志和地图上的社会关系”（Azaryahu & Golan, p. 181），内化具有民族意识形态潜文本的族群记忆，重归民族历史之根，在回忆中再构自我的当下身份认同，以延续和复兴威尔士文化。

因此，赫曼斯在诗中以深切的恋地之情呼吁文学同仁重归威尔士本土，回到圣山斯诺登山顶的圣岩厄雷利、巴德朝圣地卡德伊德里斯山——那些承载着民族独特文化记忆的文学圣地。她主张与地方结成有机整体，在独特的地理景观中寻获叙事的才思，继续讲述这片土地的久远传说，以此传承民族的历史文化。借由这种人地关系的呈现，她诗意地申明了自己的创作志向：成为当代的巴德，重返诗魂故里，以想象书写威尔士的地理景观，追溯威尔士的抗争史，构建一个充满诗意的古老世界，高歌先辈为民族自由而不懈求索的精神。在英格兰工业化浪潮不断侵蚀威尔士土地与语言的背景下，此举本质上是对威尔士人民的“方言动员”（vernacular mobilization）（Smith, p. 4），即以故土的地理意象与威尔士语为依托，凝聚族群认同，共筑民族共同体，复兴民族文化。赫曼斯在《威尔士歌谣》中对威尔士地理、语言与文化之关联的理解，以及对威尔士语传承的期许，在威尔士国歌创作者埃文·詹姆斯（Evan James, 1856）那里得到了有力的回应：国歌最后两句唱道——“只要大海依然守护我们圣洁的大地，愿古老的语言得以延续。”

然而赫曼斯这一对“原生性”族裔情感的唤起，并非意在政治分离，而是在不列颠共同框架内的为威尔士争取文化识别与表征自主。赫曼斯将罗马入侵史作为歌谣集的书写对象，赞颂为威尔士民族自由而浴血奋战的英雄先辈，因为这段历史是威尔士人耳熟能详的民族记忆，是所有威尔士人在历史寻根中特有的共同意识与交流基础（Hemans, 1841, p. 5），也是他们共享的情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她在《凯萨伦的凯旋》（*Casallan's Triumph*）中又看似矛盾地说：

自熠熠闪光之南境，
太阳神安家之堂殿，
罗马军团冠簪红缨
涉重洋，扎营不列颠。（Hemans, 1860, p. 150）

太阳神是古希腊与古罗马共同尊奉的重要神祇，执掌光明与艺术，能够为人间消灾祛厄、驱散阴霾，亦是向世间播撒文明之光的神祇。罗马军团来自太阳神的故乡，意味着他们是理性与光明的使者，必将为他们所驻蹕的不列颠带来文明的荣光。由此，赫曼斯似乎在暗示：尽管罗马军团带来了被奴役的现实，但那却是文明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此处将此前频繁使用的“威尔士”悄然替换为“不列颠”，不仅点明威尔士是不列颠民族的一部分，更隐晦地申明威尔士作为不列颠文明火种播撒源的自豪感。与此同时，诗人对待罗马入侵的矛盾心理，又有意无意间折射出她对英格兰入侵的复杂态度：罗马治下的威尔士在政治、经济、语言与宗教等方面发生了剧变，恰如英格兰入侵对威尔士传统文化造成的近乎灭绝的冲击；然而作为第一个被工业英格兰入侵、接受工业革命洗礼的民族，威尔士似乎又应当感到骄傲，因为这意味着它有望甩掉落后的标签，成为工业文明火种的播撒者。在这一逻辑下，赫曼斯为已然失势的威尔士指认了一条在新生不列颠民族中复兴自我身份的路径——落后地方（威尔士）应积极接受先进地方（英格兰）的启蒙与帮助。赫曼斯这套叙事事实上为威尔士的经济依附地位提供一种道德与历史的合理化包装：它将不平等的中心—边缘关系美化为文化传播的阶梯，将本土原本追求独立发展的文化愿景，置换为依附英格兰文明秩序的被动想象，从而在符号层面消解了本土经济文化想象中潜藏的抵抗意识。于是，她的“复兴之路”在无意间暴露出她已沦为英格兰对内施行殖民强权政策的共谋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布里韦称赫曼斯为“不列颠世界主义者”是有道理的（Brewer, p. 169）。

正如约翰斯通所言，“每个人对威尔士性的理解由他对关于威尔士概念的理解及其亲身经历组成”（Johnstone, p. 51）。19 世纪初，工业革命与社会改良深刻冲击着威尔士的地理风貌，也瓦解了其历史记忆、语言传统与文化根基，原本依托乡土形成的本土经济文化想象，在经济依附英格兰的格局下不断被消解，威尔士族群在不列颠民族的宏大叙事中逐渐丧失话语空间。为走出这一困境，威尔士精英阶层开始主动建构充满诗意的古典威尔士图景，重塑“威尔士性”，试图借此修复日渐破碎的民族经济文化想象，凝聚涣散的族群认同。赫曼斯的创作正是这一文化自救工程的典型体现：她以历史想象铺陈山顶圣岩、汪洋圣岛、黑屿秘林等极具威尔士特质的地理意象，虚构出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德鲁伊德诗意世界，重新塑造契合时代的民族精神内核。她希望以此唤醒威尔士人的民族自尊，使其在不列颠国家体系内重新确立文化身份，获得参与不列颠国家民族建构的合法地位。

赫曼斯在建构这一虚拟地域时所展现的浪漫想象，以及对自然与早期凯尔特文化的推崇，奠定了其浪漫主义诗人的特质；而她在书写威尔士地理图景时流露的文化认同与民族忧患，又赋予其强烈的现实关怀，使她的创作兼具了时代与民族使命感。正是在浪漫想象与现实关切的交织中，赫曼斯以虚拟地方书写重构民族经济文化想象，将民族危机转化为诗学力量，为威尔士探索出一条以文化符号争夺话语权、以地理诗学对抗经济依附的民族发展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地方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8BWW06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Funding: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Grant No. 18BWW061) entitled *A Study on Place Writing in British Romantic Literature*.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Long Ruicui^{ID} <https://orcid.org/0009-0007-1442-3927>**References**

- Azaryahu, Maoz & Arnon Golan (2001). "(Re)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196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02): 178-195.
- Berry, Oliver & David Atkinson (2010). *Discover Great Britain*. Lonely Planet Publications.
- Brewer, William (2003). "Felicia Hemans, Byronic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Ancient Welsh Bards." In Gerard Carruthers & Alan Rawes (Eds.), *English Romanticism and the Celtic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7-181.
- Chorley, Henry Fothergill (1836). *Memorials of Mrs. Hermans with Illustrations of Her Literary Character from Her Private Correspondence* (vol.1). Saunders and Otley.
- 段义孚 (2019): 《恋地情结》, 志丞&刘苏译. 商务印书馆。
- [Tuan, Yi-Fu (2019). *Topophilia*, translated by Zhi Cheng & Liu Su. The Commercial Press.]
- Groom, Nick (2014). "Gothic and Celtic Revivals: Antiquity and the Archipelago." In Robert Demaria & Heesok Chang & Samantha Zacher (Eds.), *A Companion to British Literature Volume III: Long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1660-1837*. John Wiley & Sons: 361-379.
- Hemans, Felicia (1841). *The Poetical Works of Mrs. Felicia Hemans*. Grigg and Elliot.
- (1860). *Poems of Felicia Hemans*.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 Jenkins, Bethan Mair (2009). *Concepts of Prydeindod (Britishness) in 18th century Anglo-Welsh Wri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Works of Lewis Morris, Evan Evans, and Edward William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 Jessop, Bob (2008). *State Power: A Strategic-Relation Approach*. Polity Press.
- (2015). "Crisis construal in the North Atlantic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urozone crisis." *Competition & Change* (02): 95-112.
- Johnstone, Jennifer (2012). *Reinterpreting Welshness: Songs and Choral Membership in Cultural Identity*. PhD Dissertation: Kent State University.
- Jones, John Robert (1966). *Prydeindod*. Christopher Davies.
- Jones, Owen & Edward Williams & William Owen Pughe (Eds.) (1870). *The Myvyrian Archaiology of Wales*. Thomas Gee.
- 罗易扉 (2023): "地方、记忆与艺术: 回到地方场所与往昔的历史经验",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 148-157。
- [Luo Yifei (2023). "Place, Memory and Art: A Return to Local Places and Past Historical Experiences."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02): 148-157.]
- Rousseau, Jean-Jacques (1915).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Rousseau*, vol.2, edited by C. E. Vaugh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wse, Alfred Leslie (1955).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 Sanchez, Juan (2014). "'England and Spain' and 'The Domestic Affections': Felicia Hemans and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New Directions in Romanticism and Gender: Essays in Honor of Anne K Mello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99-416.
- Simpson, David (2013). *Romantic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Strang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安东尼·D·史密斯 (2018): 《民族认同》, 王娟译. 译林出版社。
- [Smith, Anthony (2018). *National Identity*, translated by Wang Juan. Yilin Press.]
- Smith, Dai (1993). *Aneurin Bevan and the World of South Wales*.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 汤友云、季水河 (2018): "雷蒙·威廉斯小说《为马诺德而战》中的共同体意识",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4): 127-131。
- [Tan Youyun & Ji Shuihe (2018). "On Raymond Williams'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in *Fight for Manod*."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04): 127-131.]
- Williams, Raymond (2003). *Who Speaks for Wales?: Nation, Culture, Identity*. Edited by Daniel Williams,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 Wu, Duncan (2012). *Romanticism: An Anthology*. Wiley-Blackwell.